

“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政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积极推动历史学各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0年11月6—8日,“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三大体系”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取得了积极效果。

会议开幕式由“三大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顺洪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张冠梓致辞。张冠梓向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指出召开“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重要工作部署,也是历史理论研究所的职责所在,希望各与会专家秉持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严谨的作风,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为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张顺洪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三大体系”研究中心的组织结构和成员构成。中心成立于2019年5月,主管单位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挂靠单位是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心理事长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副理事长为山东大学教授顾奎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彭卫、北京大学教授欧阳哲生;中心主任为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顺洪,副主任为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左玉河和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吴英;中心秘书长为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徐志民;另有特约研究员12名,涉及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学科。目前,“三大体系”研究中心人员虽然不多,但他们多为各学科知名学者,是一支非常精干的学术队伍。

概而言之,各位学者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历史学各学科与专题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等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郑师渠认为,在“三大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学理的系统表达,三者互为依存,相辅相成;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不仅关乎学术本身,更关乎民族认同与国家安危,因此,必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扎根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道路;此外,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集中体现,对培养青少年的民族、国家认同至关重要,必须予以重视。顾奎斋认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不乏创新案例,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创新在层次和高度上仍与西方存在一定的差距,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仍是在西方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我们应正视这一事实,吸收西方史学的创新理念和批判精神,补足中国史学研究中重要方向、重

大事项的缺位,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水准,加强队伍建设,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彭光谦提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要说“中国话”,当务之急是让历史学话语权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牢固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站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把正气歌唱起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能再拿洋腔洋调唬人”,要“建设一支青春勃发,善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史学队伍”。廉敏提出,目前中国史学界存在四层话语,即中国古代话语、中国近代话语、中国当代话语、西方话语。中国古代话语自成一系,但已成为历史性话语;中国近代话语不足以成为体系,但确实存在并对古代话语造成“破坏”;中国当代话语创造力旺盛,但仍需应对新的社会形势与问题;西方话语自成一系,但与中国话语的矛盾日益突出。构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需妥善处理这四层话语的关系。高希中提出,西方的思想理论可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但不能对中国历史做出恰如其分的正确解读。建设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亟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观点、概念、命题等进行提炼,对中国历史的文化背景进行综合概括,系统、全面、完整、清晰地展现中国历史的文化根脉、历史根基和精神气韵。

二是关于历史学各学科中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欧阳哲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指出中国近代史学在研究领域、范式、理论方法等方面虽取得长足发展,但目前仍存在两大问题:1. 往往局限于中国近代的时代断限,很少顾及打通古今中外的壁垒;2. 中国近代史研究虽新见迭出,但真正概念化、体系化的创新乏善可陈。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探寻新的综合,创造新的生机。朱孝远和董欣洁探讨了如何构建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问题。朱孝远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话语体系,要对已有的世界史阐释体系进行梳理、甄别和完善,发扬中国史学传统,从中国人的视角提出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解决目前只研究西方学者阐释体系的状况。董欣洁认为,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系统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演变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探索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阐明中国史学界对全球一体化演变和走向的基本判断。万明探讨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提出应建立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跨时代、跨语种、跨国别的“中外关系学”,建立本土化话语、国际化话语、现代化话语、全球化话语的“中外关系史”。刘小萌在回顾21世纪以来清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后,指出清史研究应拓展国际视野,关注各国清史研究传统,避免畸重畸轻,熔铸清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并强调从继承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开展多角度研究、加强人才培养、鼓励学术创新、提高学术管理水平等方面着手。何弩探讨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话语体系的问题,认为目前中国考古学的话语体系仍以西方话语为主导,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本土化改造;提出中国考古学的话语体系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是“历史考古的话语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靳宝探讨了如何通过总结中国古代制度史撰述的史学遗产为当代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的问题,提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制度史撰述,以经世致用为根本旨趣,强调会通之义,表现形式多样,呈现出中国史学独具的特色,对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构建具有积极借鉴价值。张德明分析了如何推进新时代海外中国学建设问题,提出中国学者需要以自觉的态度研究海外中国学,以开放、包容、对话的态度面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开拓并推进海外中国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摆脱西方中国学研究范式的桎梏,增强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权。

三是关于专题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李世安以反思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整

体史观”为中心,指出“整体史观”所强调的世界“从分散到整体”一体化发展的论断,不符合世界史的发展情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不能采用“整体史观”,更不能改头换面,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吴恩远通过考察当代俄罗斯对十月革命历史意义、列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兴衰等问题评价的变化,强调建立历史学话语体系和掌握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赵庆云回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胡绳、李时岳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思考,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整体,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两个趋向”论并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实际。

最后,与会学者还就“三大体系”研究中心未来规划与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本次会议讨论涉及历史学各学科,涵盖面广,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元,但与参会学者立场鲜明、态度客观、立论谨严,一致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掌握历史学的话语权,体现了当代中国历史学者的现实关怀和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的使命担当。

(作者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徐志民)

《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

黄克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该书分为史学研究范式转移、晚清史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民国史研究路径的检讨三个部分,通过观察历史研究的思路如何转变,学者如何拓展新的研究局面,期待由此产生出新问题与新方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借鉴。该书所涉内容丰富,视角新颖,尝试打破学科壁垒,兼具思想性与方法论,展现了作者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反思力。同时,借助近代中国史学研究范式转换这一议题,该书还反思了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指出不应再把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现代性”视作唯一的、普遍的生活模式,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探索现代性的他种可能。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而且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历史、文化交融互释的产物。